

悼念李濟之先生

芮逸夫

並述其在體質人類學上的貢獻

湖北鐘祥李濟之(濟)先生，畢生盡瘁人類、考古之學。其治學之勤，造詣之深，舉世讚佩，譽滿國際者，已歷五十餘載。最近五年餘來，雖因病足，不良於行；病目，不便多讀。然精神仍佳，居常寫作不輟，閱讀不倦，而每遇重要有關學術性會議，更無不勉力出席，貢獻其卓見論。方冀其健康更佳，年壽益增，使晚輩後學，得幸求教。而竟於六十八年八月一日九時三十分，在颱風悲鳴之晨，遽爾與世長逝！傷哉！

自先生逝世噩耗傳出之後，各方震驚的悼唁，自當日敗家晚報及連日各家報刊，無不競相報導。所有悼辭唁函，大都偏重推崇先生在考古學上的卓越貢獻，而對人類學方面獨特的貢獻，則較少稱道。余惟先生在人類學上的貢獻，最早見於其在美國哈佛大學修撰人類學之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一書。筆者已在二十餘年前所撰李濟先生在考古學人類學上之貢獻一文(載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教育與文化週刊第十六卷第二期) 縷述其研究方法之要點及其結論，業經先生治喪委員會所撰之李濟之先生行述中約略予以

轉述，此處只須補述其結論即可。先生認為中國民族之主要成分有五：(1)黃帝子孫，圓頭窄鼻；(2)通古斯族系，長頭窄鼻；(3)藏緬羣，長頭寬鼻；(4)孟吉蔑羣，圓頭寬鼻；(5)暹人羣，次要之成分有三：(6)匈奴族系；(7)蒙古族系；(8)矮人族系。此外所應補述者，約有下列幾點：

一、先生本來重視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他於十二年(一九二二)由美學成歸國不久，首先便翻譯加拿大籍英人步達生氏 (Davidson Black) 的甘肅史前人種說略 (Notes 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s of the Prehistoric Kansu Race. 1925, *Memorie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Series A, No. 5*) 及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 (The Human Skeletal Remains from the Sha Kuo T'un Cave Deposit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from Yang Shao Ts'un and With Recent North China Skeletal Remains, 1925, *Paleontologia Sinica, Series D, Vol. 1*)。步達生氏的研究證明了石器時代東北沙鍋屯人與河南仰韶村人在體質上與近代的華北人相近。但他自己似乎是因為殷墟

遺址的發掘引發了他偏重考古學研究的興趣，所以無暇躬親從事人類化石及人體測量工作了。

二、先生雖因考古學研究工作的繁忙，無暇兼顧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但仍具有濃厚的興趣。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三十八年初，遷來台灣之始，曾承林氏學田的資助，調查台中縣中峯區仁愛鄉力行村之瑞岩山胞(今屬南投縣)，由本系已故陳紹馨教授任調查團長，率同當時開始成立的考古人類學系同仁同學李濟、董作賓、芮逸夫、陳奇祿、宋文薰、何廷瑞及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石璋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協纂林衡立，台灣山地建設協會理事林瑞昌等九位先生，於三十八年七月下旬前往調查瑞岩的泰雅族人。先生對體質人類學研究興趣來了，便和筆者商量作人體測量工作，當經測得邁西多邦和特比崙兩社全部十六歲以上的男一〇三人，女一一三人。先生便根據這次觀測的資料作詳細的研究，寫成瑞岩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的體質章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三十九年出版的文獻專刊第二號，山地文化特輯第七章，頁六七—一七九)。他在這一研究，發

現了關於這兩點的聯繫如下：

甲、有蒙古褶，兼有箕形上門齒的人：男四十

三人(46.74%)，女五十一人(53.06%)；

乙、有蒙古褶，沒有箕形上門齒的人：男六人

(6.52%)，女四人(4.08%)；

丙、沒有蒙古褶，有箕形上門齒的人：男卅七

人(40.22%)，女卅四人(39.69%)；

丁、沒有蒙古褶，也沒有箕形上門齒的人。男

六人(6.52%)，女八人(8.17%)。

他的結論說：蒙古褶與箕形上門齒，兩者雖

都是蒙古種人的重要體質特徵，但並不一定

並存在每一個蒙古人種的身體上；這兩點體

質特徵可能各有各的來源，及遺傳的法則；

這是極值得作一個更詳盡的一個專題研究的

項目。

三、先生對體質人類學的研究，除上述二根據

躬親實地調查資料的研究外，又曾參據中外

專家的資料，寫了幾篇對他的博士論文有所

補充及或修正的論文及講演稿。

甲、中國民族之始，載大陸雜誌，第一卷第一

期，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出版。此文參據裴

文中的周口店山頂洞之文化(英文報告)，

法人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中

國早期人(Early Man in China, 1941)，

德人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美人

虎藤(E. A. Hoodon)由猿而上(Up from

Ape, 1947)等對山頂洞人種族研究的許多

解釋，多所是正。他認為周口店山頂洞遺存

的人骨，當代表構成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中國

民族的一份子。至於其代表一個由現代的黃

種人、黑種人、白種人三種不同種族的老祖

宗組織成的家庭之說，他認為當初很可能確

有黃、黑、白三種人並存，並舉出荀子非相

篇所說的「閩天之狀，面無見膚」，山海經

的「毛民之國」的毛民與日本的蝦夷人恰恰

相符為證。因為虎藤教授所說的上洞老人的

頭骨，可以很容易地與蝦夷人的頭骨相混

(Up from Ape, p. 402)。並糾正了魏敦

瑞氏認為上洞老人與舊石器時代的中國人沒

有關係之說。先生認為中國民族的形成，不

像是互相殘殺的結果。大概的經過似乎是如

此的：洪積期後，中國一帶的氣候的週期，土

壤的品質，糧食的種類，礦質的分布，以及

自然環境中若干尚不知的成分，集在一處，

選擇了一種黑髮的，黃皮膚的人作這一塊地

方的主人翁，把原始近於白種人的「毛人」

淘汰了，送到東洋去；把原始的雜有大量的

黑種血液的「矮人」淘汰了，送到南半球去

。中國民族的形成在北方，北方的黃土選擇

了中國民族的體質，好像波羅的海產生了「

諾迭克」民族一樣，好像印度的環境黑化了

地中海民族一樣，好像非洲的森林氣候擴大

了黑種人的鼻孔一樣。

2、中國民族(Chinese People)，用英文寫

成，是在東海大學的演講稿，載五十一年出版

的考古人類學刊，第十九、二十期合刊。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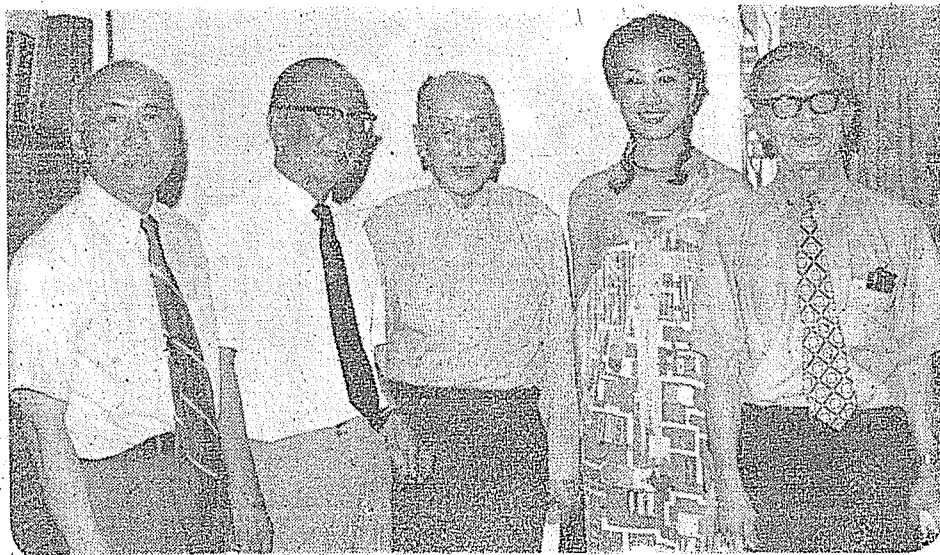
篇講演參據許文生教授(Paul H. Stevenson

)華北平原中國人之體質測量(Detailed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of the Chi-

nese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的結果

右起：本文作者芮逸夫教授、史語所研究員毛漢光夫人、李濟教授、李方桂教授、勞榘教授。





右起李方桂教授、李濟教授、蕭公權教授。

知道中國民族雖被人類學家歸入類蒙古種 (Mongoloid race)，其實只有兩種體質特徵確為類似蒙古種的特徵：其一為杏仁眼，其

二為高顴骨。但前者在被觀察的九二一人中只有百分之30.7眼褶頗為顯著，百分之8.9完全沒有，其餘則在二者之間。眼形只有百分之十四是平行的，百分之5.1顯著傾斜，其餘都只是略帶傾斜而已。後者的高顴骨問題，涉及兩顴外寬的大小問題。根據吳定良、莫蘭特二氏 (Woo and Morant) 在生物統計學刊 (Biometrika, Vol. 24, Pts. 1 and 2) 發表的「根據頭顱骨測量的亞洲人種初步分類」(A Preliminary Classification of Asiatic Races Based on Cranial Measurement, 1932) 一文，把蒙古人分為三個亞羣 (Sub-groups)：(一)北蒙古人，(二)中國人和日本人 (均屬所謂北東方人種 North Oriental race)，(三)其他東方人種 (所謂南東方人種 South Oriental race)，包括西藏人、爪哇人、達亞克人 (Dayaks)、太加爾人 (Tagals) 等等。北蒙古人 (指外蒙古人及分佈在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一帶的蒙古人) 的兩顴外寬 (bi-zygomatic breadth) 的平均數值是139.8mm至144.0mm，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是 139.2mm至134.7mm，其他東方人的是131.0mm至134.7mm；以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兩顴外寬的數值與北蒙古人的相較，後者要小半公分餘，其他東方人的又較小。這種面寬 (facial width) 測量數值的減小，究竟是因環境的或種族混雜的影響，或二者都有影響的問題，是很難說的。根據先生自己所搜集的六種歷史上的資

料，中國人兩顴外寬的平均數值如下：

(1) 周口店上洞老人：143.0mm (10,000 B. C.)

(2) 金石並用時期人：130.7mm (3,000-2,000 B. C.)

(3) 史前人 (步達生氏的研究)：1322 mm (3,000-1,000 B. C.)

(4) 殷商時期人：136.9mm (1,400-1,1000 B. C.)

(5) 隋唐時期人：133.6mm (700 A. D.)

(6) 現代北方人：132.7mm

先生以為從這些數字上去探討是很危險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在歷史所上保持的類似蒙古人的體質特徵並不是固定不變的。這些現象導致了今日中國民族形成的中心問題。中國民族的體質在歷史時期繼續不斷地變異，很明顯地反映出今日在地區上的不同。這些不同的現象，先生認為不僅含有生物學上的過程，且與歷史背景有關。換句話說，中國民族至少在表型 (Phenotype) 上是一個生物學上的單位，仍在繼續不斷的變異，但可從頭腦骨測量上予以證明的。特別要記住的是中國人的體型，包括日本人在內，和所有北蒙古人是很清楚地有分別的，唯一的例外是楚克欺人 (Chukchi)，那是一個特殊化的一羣人。中國人和其他東南亞人的關係是混雜性的。中國民族的形成，在歷史方面既有豐富的文獻，又有考古上的遺存，可供我們研究這發生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迄今

仍在形成中的中國民族。由股墟頭顱骨的研究可知殷商時期的人可分長頭種 (dolichocephalic)、中頭種 (mesocephalic) 及圓頭種 (brachycephalic) 三羣。可見在西元前 1400—1100 年之際，中國人早已處在一個鎔爐中。從歷史上看，又經殷、周、戰國、永嘉及靖康四個大移民時期。每次大移民都是由北南來的侵犯；其結果華北地方的土著吸收了草原的侵犯者，而移到長江流域以南的人，又和華南土著混雜。先生此文旨在呈示讀者使知中國民族體型的變異性、混血性，絕非人類學家所承認的典型的蒙古種。他相信「有教無類」這句名言曾給予中國文明絕大的持續活力，三千三百年來從未間斷的中國歷史可作充分的證明。人類學家和考古學應予發揚，並希望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來解答這個問題。

逸夫案：這篇論文原為五十一年七月六日在東海大學講演的初稿，嗣經修正後發表的。在同年九月五日又在亞洲國際歷史學會宣讀一篇論文，題為「中國一些人類學問題的重新檢討」(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Reconsidered)，其前半篇內容幾全與上述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相同，輔以近半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接着並指出近三百年來，中國文明在歐洲學人心目中，或則高度重視，或則極端輕視。如法國福爾特爾 (Voltaire) 及喜愛中國者等把中國文化作過度的誇張，而如德國黑格爾 (Hegel) 之流則予以攻擊，至由其盲從者所變成的共

產主義者更變本加厲。但這兩派人的共同的弱點則在缺乏中央研究院故院長胡適之先生所說的「證驗的想法」(evidential thinking)。最後先生以為研究中國文化的歷史家對中文的精通只是必需具備的初步，並應學習人類學，對人類學所研究的問題如現代人類及其祖先的統一性及人類文化的淵源須具備相當熟悉的認知，包括體質人類學、史前考古學及民族學。又因中國的制度及思想與中國的特殊文字密切相關，許多制度和心理生活都在文字中反映出來。所以歷史學者又必須具備語言學及文字學的修養。因此，他建議一種心理—生物—語言—人類學的研究法 (Psychobiological-anthropological approach)，以告參加這次會議者，特別是歷史學者。

丙、中國民族的種族史 (Ra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也是用英文寫成，是在台北中國學會的演講稿，載該會發行的學報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Vol. VI, 1969)。此文在前言中簡述中國民族自被德人布魯門巴氏 (J. F. Blumenbach) 歸入蒙古人種類迄今美國哈佛大學豪威爾 (W. W. Howells) 教授的一些不同的意見及孔恩 (C. S. Coon) 教授所發表的蒙古人種臉形的起源由於氣候影響，而其發展則在智人類 (Homo Sapiens) 移到美洲之後的理論。接着便討論中國民族的體質人類學，其內容與上文所記中國民族一文大都相同，此處不必贅述。但其結論則和前文的說略有所不同。先生認為現在的中國住民雖然

在人體測量學上顯示相當大的不同，然在大陸上或多或少出現一種幅合的體型 (Convergent Somato-type)，而這種出現將是不可避免的加速發展，因為在東南亞已經發生了另一種民族流徙的傾向。現代人口遷徙的逐漸擴大，顯然是中國歷史記載的再現，其最後結果很像那些遺民在其所經路線上與土著民族混血過程進一步加深。如果人類學者要堅持保持中國人種的純粹，讓我們引用魏敦瑞氏在二十年前所提的問題。他問題是：「產生混血人日新的是那些人呢？」魏氏自己的答案是很有名的：「在我們的地地球上，從來不曾產生過任何『純種』啊」。這個理論先生以為，中國民族的種族史可作充分證明的。

以上只是把先生在體質人類學上的貢獻作了最簡略的介紹，殊未能盡其精義。我和先生在大陸時接觸不多，自來台後，因他的寓所和我只隔一巷，過從較密，常多所請益；深知其對中國民族在體質方面研究的理想，他很希望全國各省都能有體質測量資料；吳金鼎的山東人體質之研究一書 (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一，民國三十年)，就是由他鼓勵指導而成的。他這個理想主要是為了補充其中國民族之形成一書中體質資料的不足。他的忙中抽暇，從事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也是為此。這是先生對一種學問作專門研究的負責精神，這種努力不懈，鍥而不舍的負責精神，乃是研究任何一種學問所必須具備的科學研究精神，最值得青年們效法的。